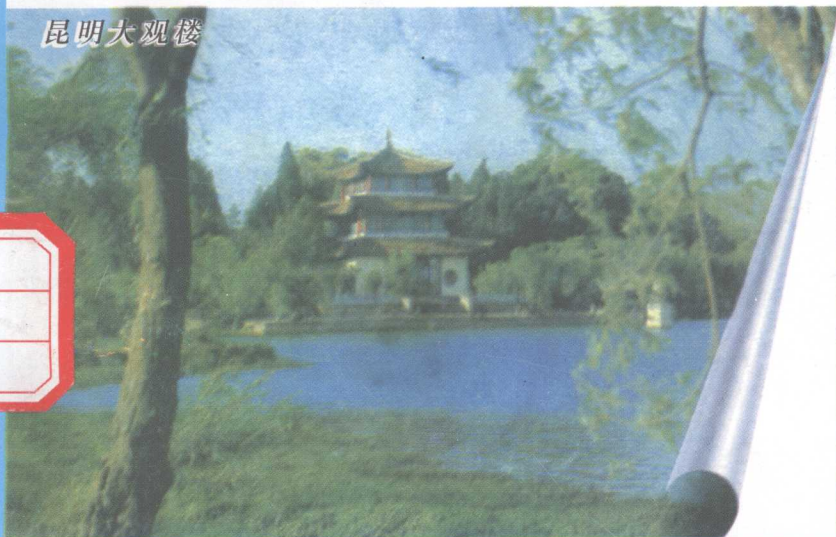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韩愈小传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昆明大观楼

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韩愈小传

赵云红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

粤新登字08号

责任编辑 邱江生

封面设计 章雯

中外名人小传·第3辑

韩愈小传

赵云红 编著

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70印张 1100千字

2002年10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2次印刷。

ISBN7—80521—844—7/K·114

定价: 136.00元 (全20册)

目 录

- 一、幼失怙恃，少罹战乱..... (1)
- 二、举进求仕，屡屡碰壁..... (6)
- 三、藩镇托志，知音难觅..... (12)
- 四、著书教学，怀才候选..... (22)
- 五、得仕长安，勉力勤政..... (28)
- 六、得罪权贵，远贬阳山..... (34)
- 七、再入长安，仕途多舛..... (44)
- 八、忠犯人主，左迁潮州..... (64)
- 九、秋菊晚霜，壮志不改..... (69)
- 十、倡导古文，承前辟后..... (77)
- 十一、以文载道，独树一帜..... (85)

一、幼失怙恃，少罹战乱

韩愈，字退之，出生于唐代宗(李豫)大历三年(公元768年)，这是“安史之乱”被平定后的第五年。他的祖籍是河阳(今河南省孟县)，但他自称是昌黎人。这是因为在唐代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重视“门阀”的观念，许多出身于普通地主家庭而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人，讲到自己的家世时，往往攀援“郡望”，即把自己说成属于某郡显贵的豪族(或世族)用以夸耀自己。而昌黎韩族显盛，故韩愈不能免俗，自称为昌黎人。另外，据《新唐书》李白的《武昌宰韩君去思碑》说，韩愈是“南阳人”，其实李白所指的是处于太行山之南和黄河之北的一个地区(相当于今河南济源县至获喜县一带)，实际上就是指河阳这一带，而不是指荆州的南阳郡。

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后，表面上除去了心腹之患，出现了转危为安、转乱为治的契机，但实际上，社会危机却在潜滋暗长，并且日趋明朗化：一方面唐代宗“厌苦兵革”，对安史降将一意姑息，任命薛嵩、李宝臣、田承嗣、李怀仙等为节度使，还将一些“武夫战卒”封为侯王，于是不但河北藩镇“收安史余党，各拥劲兵数万，治兵完城，自署文武将

吏,不供贡赋”,而且内地的某些藩镇也逐渐骄横,如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在要求增加辖区时就说:“此去长安百八十里,智光夜眠不敢舒足,恐踏破长安城。”另一方面唐代宗十分宠信宦官,虽然暗杀了过于“专横”、藐视自己的李辅国,但又先后重用程无振和鱼朝思。此二人胡作非为,肆无忌惮,弄得“方镇解体”、民怨沸腾。李光弼因此不敢应代宗诏令及时抵御侵入长安的吐蕃,仆固怀恩因此被迫反叛。再一方面唐代宗听信大阉和元载、王绪等奸佞之徒“盛陈福业报应”,深信佛教,“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。有寇至,则令僧讲《仁王经》以禳之。寇去,则厚加赏赐”。同时,他耗费巨资造寺铸佛,弄得世人“皆废人事而奉佛”。这些正是韩愈诞生前几年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状况。这些矛盾在之后相当长的岁月中大体上没有改变,在某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,这也是韩愈后来极为关注,并尽力想要解决的问题。

韩愈快二岁的时候(公元770年),他的父亲韩仲卿病故了。他的母亲因是婢妾,出身低微,故韩愈从未提及母亲是怎样离开他的。韩愈的祖父韩叡素,任桂州(今广西省桂林市)都督府长史“善化行于江屹之间”。韩仲卿是他的长子,次子少卿,三子云卿,四子绅卿。韩仲卿与大诗人李白、杜甫都

有交往。其以文章著名，做过县丞、县令一类的官，官至秘书郎。在任武昌令时做了不少好事，离任时武昌人为他立了一块《去思颂碑》，碑文由大诗人李白所写。李白称之曰：“惠如春风，三月大化。奸吏束手，豪宗侧目。”“居未二载，户口三倍”，同时政治也得以澄清，“官绝请托之求，吏无丝毫之犯。”韩少卿官任当涂县丞，“感慨重诺，死节于义”。韩云卿“文章冠世，拜监察御史，朝廷呼为子房”。韩绅卿“才君振耀，幼负美誉”，官至泾阳令。韩云卿的致力于文学、特别是善长碑志和韩绅卿的耿直和勇于打击豪强、同情人民的思想性格对韩愈都有一定的影响。总的看来，韩愈的父叔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中下层士大夫，他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阶级中下层士大夫家庭。

韩仲卿有三子：长子韩会、次子韩介、三子韩愈。韩介只做了一任太子属下的一个小官就去世了。三岁的韩愈是由他大哥韩会和大嫂郑氏抚养成人的。韩会是个名士，有口才，善文章，还擅长音律歌咏。在其出来做官之前，在江淮一带就以道德文学闻名，韩会、崔造、卢东美、张正则四人被称为“四夔”，世人认为他们都有做大臣的才能。四人喜好一起谈论治理国家的策略，其中尤以韩会为首，名声最高。后元载当国，韩会以有“文学才望”而为元载所青

睐。大历九年（公元774年），韩会举家迁居长安，任起居舍人（记录皇帝言论指示的官）。唐代宗大历十二年（公元777年），发生了查处宰相元载贪赃枉法的大案，韩会遭受株连，被贬到韶州（今广东韶关）去当刺史（唐代行政区划州的长官职称）。这一年韩愈10岁，他跟着到了遥远的南方。两年后，韩会在韶州逝世。韩会无子，其弟韩介的长子韩百川不幸夭折，次子韩老成过继给了韩会。所以当韩会一死，韩仲卿的子孙就只留下孤儿韩愈和孤孙韩老成二人，抚育他们的重任落在了韩愈的大嫂郑氏的肩上。早在迁居长安时，韩会在“公退之暇”、便开始教韩愈读书。韩愈非常聪颖，“日记数千百言”，“言出成文”。经过韩会几年的教导，他的学业有很大进步。韩会对韩愈的影响，包括道德和文学两方面，其中文学方面的影响最大。韩会在骈体文还相当兴旺之时就“鄙其文格绮艳，无道德之实”，“首与梁肃变体为古文章”，同时，撰写《文衡》以述宗旨。这些文学思想和主张对韩愈后来提倡古文运动和从事散文创作，都具有指导作用。

韩愈3岁“失怙恃”后，乳母李正真“怜不忍弃去，视保益谨”，对他细心照料，用慈母般的爱温暖了他童年的心，使他能够愉快地成长。所以韩愈每逢“时节庆贺，辄率妇孙罗拜进寿”，以表示对乳

母的感激。大嫂郑氏也对他关怀备至，所以他说：“在死而生，实维嫂恩”。韩会的去世对郑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在当时韩愈叔侄年岁尚幼，在韶州又举目无亲，她只能强抑悲伤，历尽艰难带领全家老小，载送韩会的灵柩归葬老家河阳。一家本想在河阳居住，但是唐德宗即位后，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，与中原的军阀发生了尖锐的矛盾，自德宗(李适)建中三年(公元781年)始，战乱四起。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、魏博节度使田悦、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其子李纳、范阳节度使朱滔、淮宁节度使李希烈等人先后率兵叛乱。直至贞元二年(公元786年)二月，动乱才告结束。此间郑氏只得又率家远赴江南避乱，住在宣州(今安徽宣城)韩氏父祖置下的“别业”(有一座不大的房院及四五亩田地)。此时，他们的生活已日益穷困，不如往昔了，但韩愈叔侄总算获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和学习的环境。大嫂郑氏尽心尽力抚养这对孤苦伶仃的叔侄，常常抚着老成对韩愈说：“韩家两代，就只有靠你们两个了。”时常勉励他们要成器争光。就在大嫂的督促下，韩愈发奋学习。在宣州居住的四年间，韩愈深入钻研了古人典籍，主要是先秦的儒家著作。他认为孟子的著作深得孔子真意，所以少年时的他仔细研读，并以孔、曾、思、孟为先秦正统儒学传道

系统。但除正统儒家以外，韩愈自称“仆少好学问，自五经之外，百氏之书，未有闻而不求，得而不观者。”所以他既流览了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说苑》和《述异记》等著作，又阅读了《楚辞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昭明文选》和李白的诗作等，可谓博览群书。这段时间他也曾写过一些文章，这些“感激怨怼奇怪之辞”，是用来赠送达官及其他名人，希望得到他们的赞扬，以期利于科举考试的。这在当时是一种盛行的风气。这些文章也被张籍讥为“驳杂无实之说。”

二、举进求仕，屡屡碰壁

唐德宗贞元二年(公元786年)，韩愈19岁，被宣州举为进士(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名称之一，也用来称呼被地方推举进京考试的士人)。这一年夏天他到河中府去访旧，经过中条山，想到了隐居此地的名士阳城，深情地写下了一首诗：《条山苍》

“条山苍，河水黄，浪波茫茫去，松柏在高岗”，表明他对德行高尚的阳城的崇敬。这一年秋，韩愈看到家境日益困窘，就决定到长安城求仕。他按当时的习惯，决定通过进士考试及第而入仕。一些应试者

将以前士子应试所写的赋、诗和对策给他看，他看罢“以为可无学而能”。他估计凭着自己超群的才学和擅长写作的能力，考取进士不过是俯首捉芥而已。但是他的天真自信立刻在积弊成风的考场上碰了壁。因为在当时科举考试不“糊名”的情况下，士子能否及第，并不完全取决于文章的优劣。达官显贵们为自己的子弟亲故买通考官，而应试士子们则广校门路，到处钻营，“干谒”、“温卷”、“觅举”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文章呈献给达官名宦以及闻人名士，请求给予奖赞吹嘘，博取名声，以便影响考官，利于录取。而涉世不深的韩愈，既奉儒教，又乏世故，“不敢用他术干进”（《上贾滑州书》），难免要碰壁。虽经过县和州考试合格，但在贞元二年（公元786年）二月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时，由于无人举荐，放榜时榜上无名。这时他感到十分苦闷，写下《出门》一诗以遣怀，感叹“长安百万家，出门无所之”的现实。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，是繁华都市，生活费用昂贵。韩愈要想在长安住下来再试，单靠大嫂的一点接济是不够花费的。在“穷不能自存”的情况下，他索性拦住大官僚北平王马燧的马头，自诉是马燧已故僚属韩表（韩云卿之子）的堂弟，请求马燧照顾。马燧因念部下旧情就留他侍读自己的两个儿子马臯和马畅。马畅对韩愈的照顾尤

为周到。由于马燧此前曾得罪德宗，故不敢替韩愈向礼部“知贡举”者推荐。贞元四年的秋天韩愈再次诣州县求举，还是因为无人举荐而在贞元五年（公元789年）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中落第了。

为改变礼闈不利的状态，韩愈离开长安，求助于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贾耽。他写去了一封求助信，并附上了自己在宣城所写的旧作15篇，希望得到贾耽的推荐和资助，却碰了钉子。贞元六年韩愈又靠堂兄韩弇的旧情谒见了咸宁王、河中尹、河中节度使浑瑊，并写了《河中府连理颂》，颂扬浑瑊之德，但得到的仅是资助，而没有推荐。韩愈离开浑瑊府第后，便回宣城看望了大嫂和侄儿老成。接着诣州县求举，十月初回长安，贞元七年（公元791年）二月，韩愈第三次参加礼部进士科考试，又失败了。从787年到791年，韩愈三试落第，使他初步尝到了人生甘苦和仕途坎坷，但挫折也使他丰富了生活经验，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。

韩愈在彷徨和焦虑中准备第四次进士考试时，正好碰上了政治气候有利的年头。唐德宗试图对政治有所改革，倚重力主改革的大臣陆贽。同时在文坛上，要求改革的古文作家梁肃的声望甚高。因此，韩愈和他在长安结识的好友李观、李维、崔群接连多次求见正担任朝廷右补阙兼皇太子侍读的梁肃，

得到了梁肃的赞扬和肯定。梁肃的奖掖使韩愈和他的朋友们精神大振。这一年，江南著名诗人孟郊也来到长安应试，时年已42岁。李观还为他向梁肃推荐了一番。贞元八年春天陆贄正式出任宰相，并亲自主持这年的考试，委任梁肃佐理。经梁肃推荐而录取的八个进士是：韩愈、欧阳詹、李观、李维、崔群、王涯、冯宿、庚承宣，被当时称为得人，誉为“天下选”，这一榜也号称“龙虎榜”。但孟郊并未及第，只是与韩愈结成了知己。韩愈以第13名登科，至此，经过四次努力，他才得以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但是考中进士只是取得了做官的候选资格，若要做官还必须通过另一套科目的吏部考试。所以韩愈尚须再接再厉。这年春天进士及第后，秋天就考吏部的博学宏辞科。本来韩愈、李观、裴度三人已被考功崔虞录取，不料上报中书省复审时，韩愈被黜，反被陆复礼取代。这件事说明了当时控制“选举”的大官僚的舞弊和压抑人才。为了入仕，韩愈于贞元九年(公元793年)再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试，又未被录取。这时他虽然体验到朝廷存在腐朽势力，但并未认识到朝政腐败的严重性，更不了解陆贄的改革势头已遭挫折。陆贄的耿直使“猜忌刻薄，以强明自任”的唐德宗对他的信任越来越淡。就在这一年末，陆贄罢相，梁肃也老

病而故了。贞元十年（公元794年）十月间，韩愈第三次考博学宏辞科仍未及第。他的好友崔立之写信慰勉他，要他像汴和献玉那样，最后一定会受到任用的。韩愈回信表示感谢并慷慨陈述了自己的思想和志向：求官进仕是为人而非为己，考试不中，官做不上，并不能挫伤他的志气；天下并不太平，国家并不安定，只要用人，他仍有从政的机会；如果从政不成，那他将隐居著述，总结唐代的历史，评理褒贬，“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”。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前途可能做官从政，也可能退隐；但不论哪种前途，他积极入世，安邦济民的初衷和志向不移。实际上他后来积极投身并领导“古文运动”的思想原因，就是在这几年的政治遭遇中总结出来的，是他为自己选择前途的另一种准备。这一年，李观不幸夭折，这使他感到很伤心。这年冬天长安喧传果州南充县14岁的女道士谢自然白日升天，韩愈听说后，作《谢自然诗》驳斥道教宣扬的所谓“神仙”，但他只是以“妖魑”来否定“神仙”，并未切中根本。

韩愈于吏部碰壁后，想走“常举外有进献文章并上著述之辈，或付本司，或付中书考试，亦同制举”之径入仕。他在贞元十一年（公元795年）正月廿六日和二月十六日先后写了两封信，希望得到

他们的赏识而任以官职，但都如石沉大海。于是他决定去拜见宰相，但走到光范门时，守门的士卒却不让他进去。他只得忿懣地回到寓所，后又于三月十六日写信给宰相，但等到四月底仍不见回音。遭到如此的冷遇后，韩愈明白求官毫无希望，便于五月初二日含着眼泪离开了长安。初七日，出潼关（今陕西握关县境人恰好遇见一队人马吆喝行人回避。原来这是给皇帝贡献白乌、白鸛（鸛属的鸟名）的。韩愈触景伤情，感到万分悲哀。因为他自己也是被地方选拔贡献进京的，但遭遇却不如这两只鸟，他深刻体会到“不遭时者，累善无所容焉”（《感二乌赋序》），如果碰不上好的时代，即使有许多优点的人也是不会被朝廷容纳的。六月初，他启程到凤翔去，打算向凤翔陇州观察使邢君牙干泽。到达凤翔后，因无人介绍，住在旅舍十多天没有机会谒见邢君牙，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邢，希望邢不要“以众人视之”，意思是想得到邢君牙的特殊看待，以至辟为幕僚。但那邢君牙是行伍出身，不通文墨，不可能识俊杰于贫贱中，仍然把韩愈当作“众人”接待。于是韩愈只能快快地离开了凤翔。这时节已是“秋半”了，韩愈决定回河阳“省坟墓”。九月十一日，经过偃师田横墓下。他想到田横以“高义”深得人心，而唐代的统治者却没有谁比得上

田横，因而自己惴惴无所依从。在此，他把落拓失意的悲愤尽量抒发了出来，但同时又表示：“苟余行之不迷，虽颠沛其何伤”。刚到河阳，韩愈突然看到他的侄儿韩老成护送其母郑氏的灵柩回河阳安葬。此时此刻，韩愈回忆以前郑氏对他的抚育和教诲的恩情，不禁悲痛泪下，写了一篇恳挚悱恻的祭文用《祭郑夫人文》，以祭奠郑氏，并像守母丧一样为郑氏服丧一年。在这期间，他自称过着“朝食不盈肠，冬衣才掩骼”的艰苦生活。

经过这七八年的求仕磨炼，韩愈增长了阅历，为他后来步入仕途创造了条件。由于他得到了梁肃的赞誉，结识了“龙虎榜”众人及孟郊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其中有许多是这一代的成就诗人、作家和政治家，也为他后来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打下了基础。事实上，当28岁的韩愈离开长安时，他已是文坛俊杰而闻名天下了。有人请他写文章，有人向他求教，还有大官僚、大军阀慕名邀请他去当他们的僚属。

三、藩镇托志，知音难觅

唐代仕人求官的途径除了科举考试外，还有一个比较方便的门路，就是投奔藩镇，充当藩镇幕府

的官僚，然后由藩镇向朝廷保荐，取得朝廷命官的职位。唐玄宗天宝以后，失意失意的士大夫往往走这条路。安史之乱后，军阀割据形成，藩镇势力扩大，朝廷为了维持帝国统治往往承认地方军阀为藩镇，授以节度使（朝廷派任地区的军事长官）职衔，因而这条谋官道路就更为方便。但一般地说，士大夫投奔藩镇，大多仍选择那些维持唐王朝统治和统一的节度使。韩愈在河阳为大嫂郑氏服丧以后不久就应召赴宣武军节度（掌管汴、京、亳、颍四州的军事长官，今河南开封市）董晋幕府。董晋在贞元五年（公元789年）至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任宰相，正是韩愈在长安应试谋官期间，所以对韩愈的文才有所了解。贞元十二年（公元796年）董晋为东都留守。当时割据汴州地区的宣武军很乱，节度使李万荣病瘫，朝廷想乘机掌握这支军队，便任命董为汴州刺史、宣武节度副使，主持节度使职事。按惯例节度使赴镇前都要准备一班幕府官僚，于是董晋征召韩愈入幕。河阳在洛阳南郊黄河对岸，韩愈渡河来到洛阳。七月，李万荣去世，董晋赴镇，韩愈也随从来到淳州，参加了接管宣武军的事宜，董晋委任韩愈为观察推官（节度使兼职观察使属下的办事副官），并请朝廷给韩愈加了个秘书省校书郎（朝廷掌管校刊典籍文章的官员，正九品上）的官衔。